

# 写在东亚文化交涉学创建之际

藤田高夫

关键词汇：文化交涉，东亚，文化研究

## 1 前言——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的形成与目的

本校申报的“东亚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入选为2007年度文部科学省全球化COE项目之后，我们创建了两个组织。一个是预定于2008年4月份开设的新专业“文化交涉学专业·东亚文化交涉学专修”。该专业由关西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改组而成，与传统的综合人文学专业同等级别。该专业设置一门“东亚文化交涉学专修”，旨在通过全球化COE项目培养青年研究人员。该专修每年招收硕士课程研究生12名、博士课程研究生6名，完成学业后分别授予“硕士（文化交涉学）”与“博士（文化交涉学）”学位。

另一个组织是于2007年10月正式启动的“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负责研究活动的具体事项。该中心包括了除主任之外的14名事业推进担当人员以及中心建设的后援力量（包括客座教授、助教、特别研究员、博士后）。同时，上述研究生院新专业的博士课程学生也一律录用为研究助手。

这两个组织事实上是在中心主任的带领下统一运营的。同时，本校又在此基础上设置了以校长为议长的全校性的“全球化COE项目运营协商会”，在全校规模的支援体制下展开本中心的运营与发展工作。

本中心的活动目的主要集中为以下3点。

### ① 培养东亚文化研究的新生代。

培养能以多维视角理解东亚世界是一个在多对多的关系之下交织而成的文化复合体的、并能向国际学术前沿进军的独立自主的青年研究人员。

### ② 文化交涉学的创建

超越传统的以两国关系或专业领域为界限的文化交流研究，创建一片全新的学问领域——“文化交涉学”。并构筑其理论与方法，同时展开具体事例的探讨并将之系统化。

### ③ 形成东亚文化研究的中心

用国际网络将各国独自进行的文化交流研究、对外关系研究等串连起来，引导东亚各地区的文化研究，构建具备“国际学会”的研究中心。

下文就现阶段为实现上述目标所作的具体构想进行介绍。

## 2 东亚文化交流的现状

关西大学尤其是以东西学术研究所为中心的研究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以“日中关系”为主的“文化交流研究”，这些研究奠定了本中心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中心更要把它们提升到更高、更广的境界。在此，之所以不采用“文化交流”这样耳熟能详的用语而代之以“文化交涉”一词，主要是基于以下几项对于现状的认识。

传统的文化交流研究，都是以当前的国家划分作为研究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国家为研究界线的。就拿日中交流史来说，目前的现状就是在本来应该是多元性的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中截取日、中两国出来，并以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开展研究。而即便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还要各自局限在以日本与中国为界的范围之内开展独自的研究。归根结底，日本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与中国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其研究对象无非是日本历史中的中国与历史中的日本，很难说已经形成了跨越性的、综合性的研究团体以及研究领域。比如说，中国方面把17~19世纪的日中文化交流称为“清代中日文化交流”，而日本方面却把它称为“江戸·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江戸·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这就如实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文化交流史研究就是在中国史与日本史各自的研究框架中展开的。

此外，传统的文化交流研究主要就是不同专业领域中围绕相关文物以及制度所作的事例研究的积累。从结果来看，在语言、思想、民族、宗教、文学、历史等各研究领域确实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再以“日中文化交流”来说，各领域过往的研究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足以凝聚成一组组的汇编。但是，这些成果都还是摆脱不了“个别叙述”的积累这一局限。就以日中之间来说，如何把握文化交涉全景的方法论问题仍是一片尚未开拓的领域。其实这也正说明了现代人文学研究的现状，即虽然以同一事物为研究对象，但却缺乏跨领域的交流，从而导致了全面性的丧失。

当然，在东亚，东亚文明、东亚文化圈这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文化视角或者说概念也是存在的。但对这些文明论·文化圈不加批判的研究中，却往往过于简单地把一些发达文明设定为这些文明·文化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研究就没有脱离“文明—蒙昧”、“中心—周边”这种模式。也因为此，我们不得不说，这种研究并没有把握住原本应该是具有双向性的文化交涉的这一本质，而对于文化接触的多面性也只是停留在平面性的捕捉上。本项目也以东亚为研究对象，但如果我们不能对上述的传统研究动向进行深刻的带有批判性的探讨的话，那就仍然无法逃脱“从中国向周边各国的文化传播”这种“水往低处流”式的单向性理解的窠臼。

## 3 东亚文化交涉学的目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所倡导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如下：东亚文化交涉学是一门新兴学问，它以“东亚”这一超越国家·民族的、具有某种统合性的文化综合体为研究对象，以开展于其内部的文化形成、接触、传播及变迁等为关注点，以概括了所有人文学领域的多维性、综合性的视角全面剖析文化交涉的方方面面。为构筑这门学问，至少应该意识到要实现两个“越界”，即超越国家民族意义上的研究界限，以及超越固有研究领域的界限。

东亚各地区在较早时期就形成了各自的骨架，而且未经过深层的断裂延续至今，形成了当今各国的格

局。东亚各国文化或多或少都带有这样一种特性。在这种背景之下的日益精细化的研究中，各种文化的多样性与国家或民族的独特性、固有性往往被简单地混为一谈，而该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涉意义却被逐渐淡化。但是，一种文化是不可能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之下孤立形成的，所有文化都不断重复着与他者的接触·冲突·演变与融合的过程，直至今天。东亚，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在多层面的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涉进程下逐步形成的复合体。描绘一幅作为脱离了单边文化主义立场的文化复合体而言的东亚图景，正是“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个政治课题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所热切期盼的。如果把一国的单边文化从其它文化切割开来进行研究的话，上述意义中的东亚图景是无从勾勒的。只有对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涉进行动态的、多维的理解，只有从总体上剖析亚洲文化，才能踏上通往新文化图景的光明大道，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革新东亚文化研究的起爆剂。

从“总体上”剖析某种文化，应该在综合了语言、思想、民族、宗教、文学、历史等学术领域之后才能得以实行。当然，每个研究人员都有着各自赖以立足的学术范畴，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步切入东亚文化交涉领域。比如说，本中心的几位成员长期以来从事长崎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现存于长崎的中国风格的寺院——“唐寺”中敬奉着道教神灵的问题。同时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该现象不仅是近世日本面向中国的窗口城市长崎所独具的，日本禅宗名刹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而在对此现象进行剖析时，我们感到日本佛教史、中国宗教史、东亚交易史等几个学术领域的综合与越界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毋庸赘言，这两方面的越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东亚”这一超越了一国史界限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活动目前日趋活跃，中国与韩国就已开展了以“东亚”二字冠名的研究项目。但是，日本所介绍的上述研究视角，在其它国家却并未受到善意的肯定性的接纳。同时，就人文学各领域的研究而言，以整个“东亚”为对象的研究历史跨度之长与空间跨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对于融合性的·跨学科性的·综合性的共同研究，我们也并非拥有足够丰富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中心的文化交涉项目无疑是充满挑战性的。

## 4 东亚文化交涉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所构想的“文化交涉学”最终是否能发展成为人文学领域中堪与历史学、语言学等比肩的一门学科，目前不得不说还是个未知数。正如当年宗教学从神学脱胎直至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须经整整一个世纪一样，我们这个问题的验证也应该需要漫长的等待。对于今后几年的研究工作，我们设想了以下三个方面。

### I 透过媒介物品看文化交涉的方方面面：传播物与传播途径

我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事物设定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而且媒介的类型也具有多样性与符合性通常可大致分为“人与物”。以“人”而言，既有外交使节·学者·留学生·僧侣等能以精确到个人的情况，也有海盗·移民等只能通过集团的形式来把握的情形。而“物”的范围则较广，可以是典籍之类的文字材料，也可以是交易的产品。如果再从广义上来解释“媒介”的话，那么船舶等交通工具、使船舶得以来往的交易路线、甚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等等，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其范围就会越来越大。如果对上述对象只是加以个别研究的话，那就仍然跳不出过往的个案收集的范畴，但在文化交涉学的领域中，则必须时刻认识到应如何在“东亚”这个更大的概念上进行扬弃。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否认“个别叙述性”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活动就会停滞不前。事实上，除了个别研究的积累这种形式以

外，根本就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得出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成果。但在此我们也要重申，我们必须事先有意识地明确说明为什么设定某个课题、该课题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与“东亚文化交涉”挂钩等问题，而不应该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认为这种事先意识是文化交涉学成长为一个稳固学科的第一步。而对它的验证，则是由中心全体成员参加的“文化交涉学创生部会议”的职责。

## II 区域内的文化接触及其影响

本中心“区域研究班”的职责是在东亚范围内划定某个特定的区域，有意识地把该区域内的文化交涉与其它区域的进行比较研究。区域研究班设有“东北亚”、“亚洲沿海”、“亚洲内陆”和“亚洲域外”等4个研究班。4个班中之所以没有包含“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避免设定“固定的文化中心”是本项目的方针，而以东亚文化为研究对象时，如何给中国文化定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若要研究各区域内的文化接触，那么它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因此，各研究班就必须得在该区域如何与中国文化接触，又受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未受影响）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同时，还要对该区域在东亚这个文化复合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为此，各区域研究班均事先设定各自所负责的共同研究课题，同时适当地邀请其它研究班的成员参与，再逐步总结出文化交涉中的区域特性。举例来说，包括日本与韩国等地在内的东北亚班，已开始针对“东亚的书院”这一共同主题展开研究工作。可以预见，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传统学术机构——“书院”的比较研究，可以总结出该区域内的文化继承的不同性及其背景。这些研究成果总和起来之后，相信可以使东亚地区文化交涉的多样性与同时性得以凸现。

## III 他者眼中的文化景象与文化认同性的形成

这一研究方向，与本项目所列的副标题“从周边途径勾勒出新东亚文化图景”密切相关。自画像与他人所绘的肖像之间的落差、他者眼中的自己与自身的文化认同性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考察异文化接触时必定会碰到的问题。

传统的亚洲文化研究，无论是日本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或其它，始终都是在单个国家的范畴之内来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质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剖析的。为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长期以来都把思想集中在“中心”或“核心”上，而把非中心的部分、也就是“周边”从分析对象中剥离开来，而只抽取出经过提炼的文化。但是，与不同文化的接触是不间断地持续着的，而且文化接触恰恰就是在历来被舍弃的“周边”进行着的。某种文化从进入他者的视线，再经过冲突·演变·磨合直到被接受和固定，这中间的文化交涉过程所蕴含的巨大可能性只有通过“周边”的挖掘才能得以把握。此外，经他者的眼光重新诠释过的文化景象，与经过提炼的自画像式的文化景象之间是会有差异存在着的，而这种他者眼中的文化景象又恰恰能使得在传统的中心主义的文化研究中难以观察到的、但却又是构成某种文化本质的重要因素得以昭显。本项目中把这种着眼于“周边”的研究视角命名为“周边途径”，并把它定位为构建文化交涉学的基础方法论。

有意识地从“周边”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在东亚文化的范畴内给某种文化作出客观定位。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那么在东亚传统文化范例中历来被视为拥有绝对影响力的中国，也可以被定位为文化交涉中的某个中心之一。对东亚文化范畴中的中国文化进行如此的位置调整，将会为亚洲文化研究的草图带来巨大的改观。同时“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是流动性的，并且处于多个“中心”交界处的区

域也可以看作是“周边”的一个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看到现实中的东亚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与和它相抗衡的其它各国文化的简单相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文化交涉学这一新兴学问体系中，东亚被视为是在多边文化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区域，这也就是文化交涉学的基本观点。本项目的立足点是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我们将致力于东亚文化图景的开创工作，同时还要设法避免个别文化研究中面面俱到的倾向。届时，本课题或许将为东亚文化全方位图的勾勒提供草图。

以上就是本中心所构想的东亚文化交涉学的概要以及研究方向。不言而喻，这项构想是否正确最后还取决于本中心成员的研究成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谨借此研究纪要对本中心的工作做部分介绍，以期抛砖引玉。